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国哲学

论丛
2000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德国哲学论丛》编委会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国哲学
论丛

2000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德国哲学论丛》编委会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哲学论丛. 2000/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德国哲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ISBN 7-300-02879-9/B·476

I. 德…

II. ①湖…②德…

III. 哲学-研究-德国-文集

IV. B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649 号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国哲学论丛

2000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德国哲学论丛》编委会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6 000

定价: 1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世英(Zhang Shiying)

副 主 编 刘简言(Liu Jianyan)

李秋零(Li Qiuling)

咨询委员 王玖兴(Wang Jiuxing)

朱德生(Zhu Desheng)

杨祖陶(Yang Zutao)

陈启伟(Chen Qiwei)

钟宇人(Zhong Yuren)

侯鸿勋(Hou Hongxun)

蒋永福(Jiang Yongfu)

外籍编委 G. Funke(格·冯克)

Hans-Dieter Klein(汉·狄·克莱因)

R. Lauth(赖·劳特)

W. Post(威·波斯特)

G. Schmidt(格·施密特)

Thomas M. Seeborn(托·马·赛波姆)

编 委 王 炜(Wang Wei)

刘 敏(Liu Min)

艾四林(Ai Silin)

严 平(Yan Ping)

张 慎(Zhang Shen)

张祥龙(Zhang Xianglong)

陈家琪(Chen Jiaqi)

李超杰(Li Chaojie)

朱正琳(Zhu Zhenglin)

王树人(Wang Shuren)

杨寿堪(Yang Shoukan)

李先焜(Li Xiankun)

李毓章(Li Yuzhang)

苗力田(Miao Litian)

洪汉鼎(Hong Handing)

梁志学(Liang Zhixue)

K. Gloy(加·格洛伊)

W. Kluxen(沃·克卢克森)

E. W. Orth(恩·沃·奥尔特)

H. M. Sass(汉·马·萨斯)

H. Schnaedelbach(赫·施奈德巴赫)

隈元忠敬(Chukei Kumamoto)

甘绍平(Gan Shaoping)

江 畅(Jiang Chang)

张志伟(Zhang Zhiwei)

陈嘉映(Chen Jiaying)

赵敦华(Zhao Dunhua)

靳希平(Jin Xiping)

目 录

斯罗特迪克引发的“德国地震”及其效应	甘绍平 (1)
语言哲学的两种范式——关于现代与后现	
代之争的一个视角	彭国华 (28)
“知其白，守其黑”——海德格尔关于真	
与非真的思想一解	张志伟 (44)
简论海德格尔对实体主义的批判	戴茂堂 (60)
海德格尔与上帝问题	约书亚 (73)
维特根斯坦论指号与符号	李国山 (91)
弗雷格：形而上学与语言交流	叶 闯 (103)
何谓存在	韩林合 (112)
精神分裂症艺术家与作品——雅斯贝尔斯	
的艺术家论	梦 海 (145)
尼采与俄国新宗教意识	徐凤林 (169)
卡西尔神话哲学思想初探	高乐田 (177)
克尔凯郭尔与德国哲学散论	刘泽亮 (201)
诠释学讲演	[德] 弗里德里希·D·F·施莱尔马赫
	洪汉鼎 译 (218)
论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哲学	邓安庆 (243)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Reason and	
Faith	Zhang Zhigang (264)
Die Transzendente Methode der ersten	
Wissenschaftslehre und die Seinslehre	
beim späten Fichte	Yasuhiro Kumamoto (278)

Bemerkungen über “Die Grundzüg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	Liang Zhixue und Shen Zhen (290)
--	----------------------------------

什么是康德的“第二类比”	钱 捷 (308)
康德、黑格尔哲学初渐中国述略	陈启伟 (340)

狄尔泰哲学在英语世界	李超杰 (363)
------------------	-----------

●当代哲学家小辞典●

约那思	绍 平 (375)
-----------	-----------

Résumé	(377)
--------------	-------

Contents	(385)
----------------	-------

Inhalt	(387)
--------------	-------

斯罗特迪克引发的 “德国地震”及其效应

甘绍平

尽管 1999 年地球上并没有发生 400 多年前法国医生诺查丹玛斯及十年前日本作家五岛勉所预言的大劫难，但或许是由于某种巧合，对于从哥伦比亚到印度，从土耳其到中国台湾，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人们来说，这一年却是一个并不寻常的地震之年。

1999 年 7 月份德国也经历了一场“地震”，但并不是地质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这个被德国至少十几家报刊杂志、两家电视台炒得沸沸扬扬、被德国《时代》（Die Zeit）周报称为“德国地震”、被《明镜》（Spiegel）周刊称为“德国知识界的论战”的事件，缘起于德国著名的中年哲学家、卡尔斯鲁尔造型艺术高等学校美学教授斯罗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巴伐利亚州的埃尔茅（Elmau）宫里的一场海德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演讲。

斯罗特迪克在题为《人类园的规则——答人道主义的信》的演讲里说道：人道主义本来是一项祛除人类野性的工程，然而在现代化时代，一种与“祛除野蛮”背道而驰的、由以哗众煽情为

特色的娱乐性传媒所推波助澜的“祛除约束”的潮流正席卷而来，使人类野蛮的兽性之潜能获得了极大的发挥与展现，从而彻底埋葬了有关人道主义的一切幻想。他问道：在这样一个所有温文尔雅的培养、教育、“驯服”的方法，对于今天的不再是“存在的守护者”的芸芸众生而言都失去了作用的灾难性的时代，文明的进程从长远来看是否会“导致一种对人种特性的遗传学意义上的改良呢”^①？即是否可以通过基因技术来设计人类的特征与品性，实现人种培育及人种“选择”（Selektion），从而彻底扭转和根除人类的野蛮状态呢？

大家知道，“选择”（Selektion）是一个在纳粹时代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指纳粹军队对关押的犹太人进行挑选，选上的被送进劳动营，未被选中的则进入毒气室。而斯罗特迪克在演讲时，在场的听众有不少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哲学家、神学家，他们对于“选择”这一词汇自然更是极其敏感。

据说，斯氏的话音刚落，全场听众先是一阵静静的惊愕，然后马上就响起强烈的抗议之声。1999年7月24日的《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 Rundschau）报作了如下报道：犹太历史学家弗里兰德（Saul Friedlaender）惊诧得目瞪口呆，他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有人问他“是否被激怒了”，他回答说：“我真是不知所措。”据梅格乐（Martin Meggle）讲，犹太人愤怒的表情直到第三天都还没有消失。7月28日连具有保守色彩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也指出，当时斯氏本应作一些必要的解释，然而他却错过了向被激怒、受伤害的抗议者们“敏感地给予回应”的机会。7月29日《南德意志报》（Sueddeutsche Zeitung）刊载了当时也在场的犹太哲学家施泰芬（Rainer Stephan）的评论：斯氏的报告是对海德格尔《论人道主

^① 《时代》周报，1999（38）。

义的信》的令人愤怒的解释与延续。莫尔（Reinhard Mohr）在发表在《明镜》周刊1999年第36期的文章中指出：斯氏的演讲在论证与语言上均带有法西斯式的论辩的特点。

9月2号，具有左派色彩的《时代》周报在第36期上发表了该报评论员阿斯豪尔（Thomas Assheuer）的题为《查拉图斯特拉之方案》的文章，作者介绍了斯氏这次演讲的基本内容，指出：斯氏的问题不只在在于他使用了“选择”一词，而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这一丑闻性的报告，这一试图通过基因技术使尼采关于超人的梦想成为现实的方案，不仅仅是展现了一位以尼采与海德格尔为榜样的哲学家在世界观上的迷失，而且还显露了他要彻底埋葬现代化的危险企图。其实在这之前，斯氏讲了许多话，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说自己的确不是那个意思，自己是被误解了；他似乎是想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然而阿斯豪尔的这篇文章，等于给他定了性，说明他不只是说错了话，而是他已经完全成了新右派的代言人了。这令他极为恼怒，同时也使他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他已通过此事更加“名声大噪”，另一方面他又有可能成为一位大输家。然而似乎是出于输也输得气派的心态，斯氏决定直接向哈贝马斯挑战，因为第一流的哲学家在第一流的论战中需要第一流的对手。

一周之后，他在《时代》周报第37期上以《批判理论死了》为题，发表了两封公开信，一封致阿斯豪尔，另一封致哈贝马斯，从而实际上宣告了他在政治上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作为当代德国主流的左派知识分子群体的决裂，而他以前曾是这一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员。在这两封随后招致了许多人批评的公开信里，斯氏并没有针对其报告中的论点、逻辑等学术内容进行答辩，而是以一位恶意攻击的受害人的身份发泄了一通情绪。在致阿斯豪尔的公开信中，他讲道，每个社会都需要语义学上的和有形的警戒系统，以便防范道德上或政治上的、来自内部或来自外

部的对它的进攻与侵害。如果我斯氏讲的不负责任的话，我接受任何形式的警告，只要它能够导致文明的对话。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您的文章所体现的是警戒系统的堕落，体现了警戒主义向丑闻主义的蜕变，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新闻记者所追求的不是批判精神，而是迎合市场需求的轰动效应。由于斯氏认为阿斯豪尔在这场针对他的“诽谤”狂潮中只不过是一个受人操纵的阵前打手，故他将更多的笔墨用在对付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对手，即他所断定的阿斯豪尔及莫尔之批判文章的幕后唆使人——哈贝马斯身上。

在致哈贝马斯的公开信中，斯氏不顾他所认为的与哈氏的“多年友谊”，不顾他对哈氏曾经拥有过的高度敬重（因为他承认哈贝马斯有些著作有益地影响了他这整整一代人），一开始便历数哈氏的几大“错误”：第一是哈贝马斯将斯氏定性为“青年保守派”。第二是哈氏在他背后讲了很多坏话，哈氏打电话一会儿打到汉堡，一会儿打到耶路撒冷，向他人传播对斯氏的报告的看法，委托自己的弟子、《时代》周报的阿斯豪尔及《明镜》周刊的莫尔写批判文章，向同情斯氏观点的人施压，甚至有悖于学术的、朋友间的基本道德，将本来是私下送给他的斯氏演讲稿的复印件寄给新闻记者，还写了歪曲性的导言。斯氏责问道：作为一个民主对话的理论家，哈贝马斯同许多人谈论我，而从没有直接同我谈，这岂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三是哈氏代表着一种新版本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道德专制，它倚仗着自己在新闻媒体及学术界长期积累起来的巨大能量，自命为导向真理之通道的把守者，而将它的批判对象贬损为物体，不再作为人来对待。斯氏声称，从哈贝马斯这次对他采取的行动中，他看到了哈氏是怎样将自由主义之面纱撕破的，看到了哈氏本人及其弟子是怎样理解“交谈”、“思考”、“进入问题”、“公开”、“坦率”这些概念的，总之，看到了“交往行为的真实面目”。斯氏的最后结论是：批

判理论在9月2日死了。

似乎是由于斯氏在对阿斯豪尔的公开信中，指责阿斯豪尔的“诽谤”是基于一个并非出自斯氏之手的报告文本，为了便于读者进行对比，《时代》周报第38期全文刊载了斯氏的讲演稿。斯氏在驳斥阿斯豪尔时讲道：他在报告里曾提出必须为生物技术制定道德法典，而在此法典中必须把以个体为对象的合法的遗传医学上的优化措施与以集体为对象的非法的生物政治区别开来。然而人们有机会读到这篇演讲稿后，无论怎样从头到尾地查找，也未能发现有关作出上述区别的文字。恰恰相反，任何“拜读”了这篇报告的人，只要具有正常的理解能力，都不难体味到斯氏谈论的正是生物政治，而绝不是什么个体优生学的内容。《时代》周报在发表斯氏演讲稿全文的同时，还特意刊载了美国著名的法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一篇赞同将基因技术用于人类的论文，然而这篇文章一来从内容上看并没有触及基因工程伦理学中争论的实质，二来并不是针对斯氏所引发的这次“地震”所写，所以对于斯氏而言，并不构成什么有分量的理论支持。

一时间人们都在等待哈贝马斯的回音。如果他没有回击，则表明他默认斯氏说的都是事实，那么后者肯定要大得一分。如果哈氏给予回击，不论以何种规模，则更是正中斯氏的下怀，因为后者期待着与哈贝马斯进行公开讨论早有多年了，这次若是争起来，斯氏自己还是作为一个正式的对手呢！然而哈贝马斯似乎早已识破斯氏的意图。一周后，为公众所期待的哈贝马斯的回音终于来了，然而《时代》周报上出现的却只是他写的一封短短的读者来信。他说斯氏编造的故事使他惊异得笑不出声来，莫尔并不是他的学生，他是通过莫尔的出版物才知道这个名字的，他与《明镜》周刊也没有联系。他倒是与阿斯豪尔谈到过斯氏的演讲，但他相信阿斯豪尔这篇有见地的文章根本就无需他的启示，况且他根本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另外，斯氏显然是高估了他哈贝马斯

对斯氏的东西的兴趣，哈贝马斯仍然属于这样一代人，这代人相信能够坚持到底的是更优秀的理论，而不是靠牺牲别人来自我表演的那种东西。^① 这样一来，哈氏的这封读者来信便使斯氏试图掀起一场“有分量”的论争的预谋终于成为泡影。

虽然哈贝马斯没有加入论战，然而其他重量级的人物却都并没有沉默。斯氏所期待的有分量的论文出现在《时代》周报第39期上，可惜都是抨击他的。一篇出自著名的犹太裔伦理学家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这位曾执教于海德堡、柏林的老教授寥寥数言就点到了斯氏演讲中致命的逻辑缺陷，令人感觉到仿佛是老教授仅仅轻咳了一声，斯氏那用华美的词句及精巧的骨架细心构建起来的一座思想宝殿顷刻间即土崩瓦解。

另一篇则出自与斯氏年龄相仿的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弗兰克（Manfred Frank）。弗兰克自称对哈贝马斯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且一直都十分欣赏斯氏体现的新一代文化理论家所特有的风采，这样似乎就表明了他所持有的是摆脱了派别色彩的客观中立的立场，表明了他的这篇文章完全是就事论事，是针对斯氏的演讲及斯氏在回应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时的态度的。在弗兰克看来，斯氏的演讲是一篇奇特的修辞学的混合物，要想在其中找到任何一点点清晰的命题、信念及有关理性之行为的建议，其难度无异于试图将布丁钉进墙里。弗兰克认为，斯氏的失误还表现在他的补救措施上，恰恰是这种措施反而激起了更多的谴责。斯氏将哈贝马斯指责为是对他的批判攻势的幕后组织、操纵者，这只能令人觉得斯氏对自己高估得不着边际。斯氏宣布批判理论死了，人们不禁要问，“死了”与有效性有何联系？康德、歌德早就死了，这影响了他们的一些观点的正确性吗？

又是一周之后，《时代》周报第40期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

^① 《时代》周报，1999（38）。

发表了阿斯豪尔的文章《什么是德意志?》，他认为有关斯氏的论争已经超出了基因工程伦理的层面，涉及统一之后的德国的精神基础，涉及民主的文化阵营（哈贝马斯）与新保守主义及后现代派之间的思想较量。而在该报的第41期的相同位置上，德维克（Roger de Weck）则以《文化斗争》为题，展示了他对以哈贝马斯及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Günter Grass）为代表的思想流派的反叛，而这一反叛所体现的正是斯罗特迪克的精神。

毫无疑问，尽管有德维克式的一批人的支持，斯氏在这场德国伦理学的地震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输家，他不仅输掉了这次论战，而且他——因为这次丑闻性的演讲——输掉了本来极有把握的出任卡尔斯鲁尔造型艺术高等学校校长的可能性。在长期非常不景气的战后德国哲学界，这位拥有18本著作的斯氏曾被视为一个例外，是一颗耀眼的哲学明星。20世纪80年代初他写成了厚厚的两卷本《玩世不恭之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将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人物区分为快活的、大胆的犬儒派与以启蒙运动中披着羊皮的狼为代表的恶的玩世不恭者，并且提出只有像摩西（Moses，古以色列的人民领袖）、大卫（David，以色列人的理想国王）、路德（Martin Luther）、奥伦斯比格尔（Eulenspiegel，民间话本中的英雄）以及不怕将打耳光作为论据的知识分子才是精神的真正推动力。这部著作后来成了畅销书，连哈贝马斯都赞扬他善于将哲学杂文与对时代的诊断出色地结合在一起。斯氏本人也凭借着这种与战后思想界由于沉浸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所造成的长期的严肃气氛截然不同的“优秀的”、“大胆的”犬儒主义精神气质，凭借着像魔术师变戏法那样抛出一个又一个怪异的概念的能力，赢得了自己在哲学界的地位：1992年他在卡尔斯鲁尔造型艺术高等学校获得了讲座教授的职位，第二年又得到了维也纳造型艺术科学院文化哲学与认知

学研究所所长的宝座。迪德里西出版社（Diederichs Verlag）聘他为“哲学就在现在”系列丛书的主编，最近他又成了德国著名的舒尔卡普（Suhrkamp）出版社的顾问，在德国他是仅次于哈贝马斯的有名的哲学家。如果说斯氏过去的成就源于其“大胆”，那么他今天的失利则就应归咎于其“鲁莽”了；他的“用词不当”肯定不是故意的，但他的这种前前后后的行为及补救措施当然也绝对不是聪明的。

二

斯罗特迪克所引发的地震或论争涉及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许多层面，涉及人们在基因工程伦理、科技伦理、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上的不同理解与思考。

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引发了如此巨大的社会震撼，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最大的伦理挑战来自于基因技术与生物技术。^① 因为这一技术使人类拥有了对人的受孕、出生、身体构造、心灵健康、生命历程及预期寿命等加以控制和把握的能力，而上述这些重大内容在以往的人类史上一直都被认为是出于造物主或命运的操纵。通过基因技术，人类正在实现对自己进化历程的控制，从而有可能改变现存的整个人类图景，有计划地培育一种新的人类类型，一种前所未有的生物政治的出现似乎不可避免。对于任何一项科技进步，人们自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评价。在基因工程技术上，情况更是如此。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卡瓦利埃（Liebe Cavalier）坚信遗传工程的危险性并不亚于核裂变，甚至比核裂变更为严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英国的罗特布勒特（Joseph Rotblat）则惊呼

^① 参阅《明镜》周刊，1999（39）。

由于基因技术，人类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

当然更多的人相信基因技术可以造福人类。这不仅是指通过细胞复制来制造人们需要的人体器官，而且更是指按照某种规则对未来人类的身体与精神重新进行塑造，使人类更健康、更美丽、更有能力、更为幸福（从而使目前的人类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得不依赖美容手术、心理药丸的历史成为过去）。早在 1962 年，动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便想到了通过遗传上的选择来改善世界居民的智力质量，从而使人类达到“完满”的可能性；而 1999 年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南德意志报》上更是预言人类将培育没有那么多暴力倾向的新人，在试管中创造尼采的“超人”，从而进入所谓“后人类之历史”。

由此可见，有关利用基因技术使人类得以优化的见解，并不是斯罗特迪克的发明；而且，如果追述一下历史，我们便可以发现，关于人类优生学的课题其实早在柏拉图那里便已经开始讨论了。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便提出男女应按“最好的与最好的，最差的与最差的”之原则结合，在《国家篇》中则要求由哲学王来确定最好的男女的结合时间与方式，从而使绅士的人种纯洁地得以保存，让美丽与智慧尽可能地得以提高。然而柏拉图梦想一直都未能实现，到了虔诚的中世纪更不可能会有人想像要对人——上帝之形象的相似者——进行改良。直到宗教改革时代，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才又重新提起了柏拉图有关未来国家蓝图的一些想法。进入启蒙运动时代，人们才坚定了关于创造一种更好的人类的信念。19 世纪初，傅里叶（Charles Fourier）幻想人们未来将按严格的规则生活在乡村公社里，身高可达两米，体重可达 200 公斤，寿命可至 144 岁，世界人口可达 30 亿；而且天资极高：具有荷马水平的诗人就达 3 700 万，牛顿式的数学家也能达到同样的数量。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尼采更是以“超人”的学说将古希腊时代的理想提升为一个系统的方

案。他提出应通过某个途径以一种与目前完全是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教育方式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培育伟人，从而结束直到今天被称为历史的这段由愚昧及偶然性所统治的时代。培育在尼采那里是指优秀的教育，但他也提到过人种本身的改良，甚至认为为了造就更高的人种、新的贵族，可以以其他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这样他也就为以后出现的疯狂的种族操纵、种族清洗之理念提出了思想灵感。几乎是在与尼采传播这一理念的同时，达尔文的一位表兄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于1883年提出了“优生学”这一概念，将优生学定义为通过人种培育使未来人类在遗传特征上得到改良的科学。从此以后，并非是以思想家，而是以自然科学家为主体的研究者纷纷开始投入对人类的生物改良的设计，到了20世纪初，优生学专业协会的建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许多优生学学者都是严肃的社会改良家，他们认为贫困并非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因为穷人身上载有道德上或学习能力上的不良的遗传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干预恰恰是一种伦理上的命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阻止有害的（包括致病的）特征的遗传，使人们从病痛、酗酒、犯罪、贫困中解放出来。这些学者因而将优生学看成是社会政治的一个基础性的科学，幻想通过这一学科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开辟一条通向人类光明前景的康庄大道。

早在1933年以前，优生学的理念不论是在左派还是在右派阵营，不论是在洛杉矶、伦敦，还是在柏林都得到了普遍的赞同与接受。然而德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从希特勒上台以后，优生学及种族卫生学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反人道的现实的实践纲领，成了希特勒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石。希特勒的《预防有遗传病的后代之法律》使成千上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癫痫病患者、盲人、聋哑人、肢体畸形者及酗酒者失去了生育能力，《婚姻健康法》严禁遗传病患者结婚，疗养院里的病人必须进行“遗传生

物学方面现有特征”之内容的登记，从而为消灭精神病病人打下基础。而对“遗传上健康的”非犹太的德国人，纳粹政府则给予“婚姻状况贷款”，鼓励“遗传特征优越者”的生殖。秘密的“生命之源”（Lebensborn）项目，要求雅利安（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妇女应尽量与党卫队队员结合，以便生育“纯种”的雅利安后代。当时世界上的许多专家欢呼这一“德国模式”。国际优生学家社团的刊物《遗传学新闻》（Eugenical News）称赞德国在从生物学的角度塑造民族性格方面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1933年的德国《绝育法》为人类繁衍的优生学意义上的控制奠定了一块里程碑。直到1941年美国参战以前，德国人的优生学研究一直都有美国资金的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大屠杀及与优生学观念密切相关的纳粹罪行的彻底暴露，才终于导致优生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威风扫地。然而，即便是这样，在当时仍有少数生物学家、医学家不愿放弃优生学的想法。例如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美国的马勒（H.J.Muller）在1962年就又提出：如果要使有害的遗传因素得以控制的话，3%的人口必须绝育。

尽管今天的德国人仍然能够体察到优生学这一话题的沉重的历史感，但对于广泛的国际社会而言，该学科曾被纳粹法西斯主义利用过的这段历史并不构成人们进行优生学研究的政治障碍。毕竟，纳粹法西斯主义早已成为过去；假如人类能够通过改变基因的方式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当然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这样做。

然而问题在于：其一，从技术的可能性上看，通过基因工程使人类得以优化的方案在今天还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虽已破译了一些遗传物质，但就细胞生物学层面的基因的相互作用而言，仍然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人们已诊断出800多个遗传疾病，平均每个人有六种遗传病。从理论上讲，通过用健康的基因取代有缺陷的基因，即可从根本上祛除上述疾病的发生。